

遼西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 ——兼論華夏邊緣的形成

王明珂*

本文探討，由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代，遼西地區由混合農業走向游牧業的人類生態變遷，以及其與華夏族群邊界形成的關係。

在遼西、燕山地區，由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殷商時期，並沒有顯明的華夏與非華夏的生態、文化或政治邊界。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當地人類行農業並畜豬、狗。到了晚期，因氣候乾旱化，不利於農業發展，人類活動減少，並有武裝化傾向。在經過商周間的調適期後，人們重新利用這地區。此時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們仍行農業，同時畜養更多的草食動物。這種生態適應，使每一人群所需的生態區，都較前期農業人群所需的大了許多，如此造成人群間的衝突與進一步的武裝化。武裝衝突造成更多的人群不願從事農業生產，而依賴畜牧、漁獵與掠奪。

北方人群的移動化、畜牧化、武裝化，反映在中國古史上的，就是戎狄華夏之分的概念出現在南方人群中。西周因戎禍而亡之後，「華夏」這樣的自稱在中國文獻中愈來愈普遍；華夏成為極力維護自身族群邊界，以保護共同資源的人群。華夏愈互保以壟斷南方資源，愈逼使遼西與燕山山地的人群更依賴畜養動物，以及進一步的武裝化、移動化，以向南方侵奪。為了對付南方華夏的凝聚，燕山以北及遼西地區的游牧人群，起先結成較大的政治群體，東胡。在燕國北征，以及西方匈奴興起，兩方面的壓力下，這地區的人群全面游牧化，並發展出分散化、平等化的游牧部落組織（鮮卑、烏桓），以適應新的局面。

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論文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華夏邊緣形成的關鍵問題

對於華夏（或漢族）這樣一個族群，歷史與考古學者們對其起源一向有特別的興趣。雖然這些研究已累積了相當的成績，但是無可否認的，這些研究也經常捲入與「認同」有關的一些論戰中。在歷史學界，華夏民族西來說與本土起源說間的爭論，由上一世紀末延續到本世紀中葉。在一九四九以後的中國考古學界，中國文明起源的黃河流域一元論，到滿天星斗的多元起源論之間，也有激烈的學術爭執。這些學術爭論的背後，我們都能發現一些族群中心主義與認同危機的背景。其原因主要是，人群以「起源」來解釋本族群或他族群的本質，以建立族群內或族群間的資源分配體系。

關於族群本質的問題，近二、三十年來，許多研究族群現象的人類學者的意見值得重視：族群不是由人類生物性繁衍所「生成」，而是由人群在特定環境中的生存資源競爭所「造成」。在生存資源競爭中，一群人設定族群邊界，或改變原有的族群邊界，以維護共同資源。¹ 因此，研究華夏本質的一個新方向就是：探討在某一關鍵的時代，在某一關鍵（邊緣）地區，華夏與非華夏間族群邊界形成的過程。本文所探討的時空範圍，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漢代的西遼河流域與燕山地帶，便是這樣的一個關鍵時代與關鍵地區。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本地區大多在紅山文化的涵蓋範圍之中。紅山文化與南方同時的仰韶文化有密切的關係。無論是紅山文化彩陶的器形、紋飾，或石製農具所顯示的生活方式，或半地穴式的居址，都是在南方的仰韶文化中常見的。而在紅山文化之後，普遍分布在本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也被認為是龍山文化的變種。以考古文化而言，並沒有明顯的文化或經濟生態上的邊界存在。但是，到了戰國時，燕人在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間築長城，以隔斷「非我族類」。到了漢代，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之間已是遊牧的鮮卑與烏桓的天下

¹ 這個研究趨向，可以1969年Fredrik Barth 所編的*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書為代表，此後，近二十年來在族群現象上又累積了許多精闢的研究成果。有關社會人類學中的族群研究及理論，見王明珂，〈什麼是民族：以羌族為例探討一個民族誌與民族史研究上的關鍵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989-1027。

了。並且考古遺存也顯示，戰國到漢代，西遼河流域人群的文化與經濟生態，也與南方農業社會有強烈的不同。一個華夏的族群邊界就此出現。因此，在夏家店下層時期至漢代，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人類生態變化，以致於華夏將另一些人排除在華夏之外，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與本文有關的歷史或考古學研究很多。在考古學方面，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春秋戰國時分布於燕山與大小凌河流域的青銅短劍墓，漢代的烏桓、鮮卑墓等等，都有豐富的發掘、報告與研究。大多數的這些研究，都專注於器物的演變，期望以此結合文獻，來指認某種考古文化與某古代民族的關係，或是民族的遷移。因此，對於夏家店下層、上層文化，或戰國時的青銅短劍墓所代表的歷史人群族屬，都有許多深入的研究。但是，對於各考古文化人群的經濟生態卻討論得很少。譬如，夏家店下層文化到上層文化間的變化，學者常傾向於以人群的遷徙來作解釋，² 而忽略了相關的人類生態變遷，及其動因。

在歷史研究方面，多數學者的興趣仍在各古代東北民族，如山戎、東胡、烏桓、鮮卑等的相互關係與族源上。這些研究，對於本文的探討，多少有些助益。但是，基本上本文與「民族溯源」無關，而著重於討論這些人群的經濟生業與社會組織，尤其是有關遊牧起源的問題。關於東胡、烏桓與鮮卑的社會經濟，馬長壽與林幹都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³ 本文的探討，較集中在由東胡到烏桓、鮮卑的遊牧生態轉變，尤其是作為走向專化遊牧業必要歷程的人群政治社會組織的變遷。

本文所討論的遼西地區，是中國三個主要遊牧類型（青藏高原型，蒙古草原型，滿州森林草原型）的起源地之一。關於前兩種遊牧類型的起源，我曾以中國西部的河湟地區，與北部的鄂爾多斯地區為例，探討這個人類生態上的重大變遷。⁴ 在河湟地區，齊家文化之後，當地人群使用的陶器愈來愈小，並偏好隨

² 劉觀民、徐光冀，〈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12-14。

³ 馬長壽，《烏桓與鮮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林幹，《東胡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⁴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身飾物；以養羊、牛來取代養豬，人類活動遺跡往高處擴張；居址與農業工具逐漸消失。所有的現象都顯示，人群開始以草食性動物來利用高地的草資源，並放棄一切阻礙遷移的文化因素。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例子中，遊牧化的過程包括：氣候變化→農業人群放棄在此地的佔居→爭奪南方適於混合農業的資源，並多養家畜，以適應經常移動的軍事生活→華夏形成以保護共同資源→北方人群遊牧化，並重新佔居鄂爾多斯地區。以上兩種遊牧類型，在漢代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政治組織；河湟羌人以分散的部落為主，匈奴以「國家」為主，以配合各自的遊牧經濟。⁵ 因此，本文可以說是以不同的生態環境為背景，對中國北方遊牧起源，以及遊牧經濟與社會組織關係，作延續與補充性的研究。

地理環境：本文所探討的地理範圍是，北起西遼河北岸，南到燕山、京津、唐山一帶，西起大興安嶺南麓、七老圖山，東至醫巫呂山。在這區域內，主要包括西遼河（西拉木倫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與南麓的京津唐地帶等地理區。西遼河與老哈河一帶多沙丘，南岸是著名的科爾沁沙地。沙丘間有草原低地與沖積平原，屬半農半牧區。西面靠大興安嶺南麓的地區多森林。本區南方的燕山地區由中低山、丘陵、盆地構成。燕山以南的平原區，氣候溫暖濕潤，土壤條件良好，是主要農區之一。山地北麓乾旱少雨，冬嚴寒。溫帶乾旱與濕潤區的分界就在燕山北的承德、錦州一線。大小凌河流域夾在西遼河、老哈河流域，與燕山地區之間。多高山，丘陵起伏，少森林。整個燕山以北的遼西地區，在目前只有少數的、點狀的森林分布。但環境考古與歷史文獻顯示，這裡曾是沼澤森林密佈的地區；在本文中我們將說明這些環境的變遷，以及有關的人類生態變遷。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chapter 2; 王明珂,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 (1994): 375-434。

⁵ 王明珂, 〈匈奴的遊牧經濟—兼論遊牧經濟與遊牧社會政治組織的關係〉,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 (1993): 42-49。

二、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時期

這個時期的西遼河流域至燕山地區，普遍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分布範圍內。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分布，北起西遼河（西拉木倫河），南至海河，西起壺流河流域，東至遼河（圖一）。

夏家店下層文化與龍山文化的關係，曾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夏家店下層文化愈早期階段（接近龍山文化時期），磨光黑陶所佔比例就愈大。類似中原龍山文化的卜骨，也曾出土於內蒙古寧城縣小榆樹林子，赤峰縣東山嘴、藥王廟、夏家店、蜘蛛山等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赤峰東山嘴遺址出土的陶器，無論是從器物形制和風格，還是紋飾看，都具有濃厚的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因素。年代較晚的夏家店下層遺址，如敖漢旗大甸子，北京琉璃河，及大廠大坨頭等，則體現商文化的器物較多。⁶ 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發現的爵、簋、盃等酒器，與鄭州二里崗商代陶器群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隨葬陶器上的彩繪、圖案有些類似商周青銅器上習見的各式雲紋，還有少數以動物面、目為主的紋飾。⁷ 這些都顯示，晚期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商文化間的密切關係。

對於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周鄰文化的器物型態比較，與其源流，學者們已有很好的研究，在本文中不再贅述。我們的重點在於人類生態及其變遷。關於這方面，考古學者曾指出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以農業為主要生計，狩獵、畜牧與漁業也因地區有不同的重要性；這些陳述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在本文中，我將對這些生業所代表的人類生態意義，尤其是各種動物在當地人類生態中的地位變化，作進一步的探討。以下我們分三個地理區—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與燕山地區—來探討人群經濟生態。

⁶ 遼寧省博物館等，〈內蒙古赤峰縣四分地東山嘴遺址試掘簡報〉，《考古》5（1983）：429。

⁷ 劉觀民、徐光冀，〈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6。

老哈河流域

老哈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出土有墓葬、房屋與石城遺址等，顯示當時在這一帶有相當活絡的人群活動。考古學者在敖漢旗南台地遺址，曾發掘夏家店下層房屋三座；在塔山也發掘了兩座。南台地F12有一柱洞，柱洞四周貼一圈陶片，防止柱頭腐爛。塔山F1房內有三層堆積，房子沿用的時間較長。以上二者都是半地穴式方形房子。⁸ 赤峰東山嘴遺址的南緣，有殘石牆遺跡。東山嘴遺址的居址為半地穴居，圓形與方形房子。屋內有兩個大柱洞，柱洞底與壁均貼上碎陶片，以防柱頭腐爛。⁹ 這些對房屋柱頭的防腐蝕措施，石砌圍牆，以及重覆鋪陳的居住面，都顯示當時人的長期定居生活。類似的石牆，重覆沿用的房屋居住面，也見於寧城縣小榆樹林子遺址。¹⁰ 敖漢旗大甸子遺址的夏家店文化墓葬，有八百多座，排列緊密而有序，且無墓口相疊現象，¹¹ 這也顯示，使用這墓地的人群是長期居住在這兒的。

赤峰東山嘴與寧城小榆樹林子遺址所發現的殘石牆，顯示當時這類聚落有石牆防護。這種以石牆防護的聚落，據調查，僅在昭盟敖漢旗三個公社就發現380多處。¹² 在英金河、陰河流域，也曾調查過43座這種石城。¹³

什麼樣的經濟生業，能讓他們聚落分布密集，且過著長期的定居生活？在這一帶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中，普遍發現石鋤、石鏟、石刀（鐮）、石杵等，

⁸ 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2（1977）：9-10。

⁹ 遼寧省博物館等，〈內蒙古赤峰縣四分地東山嘴遺址試掘簡報〉，《考古》5（1983）：421。

¹⁰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寧城縣小榆樹林子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2（1965）：619-20。

¹¹ 劉觀民，〈內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4（1992）：304。

¹² 蘇赫，〈從昭盟發現的大型青銅器試論北方的早期青銅文明〉，《內蒙古文物考古》2（1982）：4。

¹³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的石城遺址〉，《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82-93。

表明農業為當時人們的主要生業之一。¹⁴ 另外，以刮削器為主的細石器，也普遍出現在這一時期各遺址中。¹⁵ 這種以質堅且脆的石材所作的小型石器，適於切割動物的皮肉，應與動物性資源的利用有關。

這時期各遺址中，都出現一些動物遺存。赤峰東山嘴遺址的房址與灰坑填土中，出土大量的豬、狗、羊、牛等獸骨。大甸子墓地中有埋牲習俗，以豬、狗埋入殉葬。藥王廟夏家店下層遺存中，有狗、豬、斑鹿、羊等動物骨骼。夏家店遺址中的動物，有狗、羊、鹿科、牛科，可能有黃牛。蜘蛛山遺址的夏家店下層遺存中，有牛、羊、豬、狗、兔等動物骨骼，其中牛、羊、豬較多。寧城南山根遺址的夏家店下層遺存中，動物骨骼有豬、狗、牛、羊、鹿、兔、狐、鳥類等，其中豬、狗的個體較多。¹⁶ 有些報告中指這些牛、羊、豬、狗為馴養動物，但卻沒有提到是否有經動物考古學的鑑定。¹⁷ 無論如何，大甸子墓葬中以豬、狗作為葬禮中的埋牲；敖漢旗小河沿略早於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遺存中，已有陶製的豬頭、狗頭，這都說明在當時豬與狗已是馴養的動物了。

以上各遺址的碳十四年代（經樹輪校正）為：赤峰蜘蛛山，2466-2147 B.C.；敖漢旗大甸子，1685-1463 B.C.，1735-1517 B.C.。¹⁸

¹⁴ 遼寧省博物館，〈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11；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1（1974）：118，12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2（1979）：224-25；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1975）：125。

¹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225；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125。

¹⁶ 遼寧省博物館等，〈內蒙古赤峰縣四分地東山嘴遺址試掘簡報〉，《考古》5（1983）：429；劉觀民，〈內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4（1992）：306-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22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報告〉，120，12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126。

¹⁷ 遼寧省博物館等，〈內蒙古赤峰縣四分地東山嘴遺址試掘簡報〉，429。

¹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數據集〉，55-56。

大小凌河流域

文化堆積厚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也密集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如在北票豐下附近，不到兩公里的距離內，就發現此類遺址四處。¹⁹

許多大小凌河的夏家店下層居址，都發現有石砌外牆，以陶片貼底邊以防腐蝕的柱洞，以及屋內居住面重覆鋪設的痕跡。²⁰ 北票豐下遺址發現有圓形單間房子12座，長方形單間5座，方形雙間一座。房子的結構大多是，內牆為土坯砌牆，個別為夯土牆或泥土牆，或石砌牆。屋牆之外，還築有石圍牆。室內鋪黃土草拌泥，或黃硬土居住面。居住面大多不只一層，住一段時間加墊一層，一般有2-3層，最多達6層。居址中的柱洞中，也有以碎陶片層層搗實的柱礎。²¹

遼寧建平喀喇沁河東遺址共發現房址8座，其中在T1發現的5座較完整。五座房址依次疊壓，後期房子在前期房址上墊土重修，五座房址堆積厚達2.4米。居住面大多都是先墊土，再抹草拌泥，再抹一層白灰面，使之光滑。五座都是半地穴式，最晚的F1與F2屋外有弧形石牆，其餘屋址不見石外牆。F4有四層居住面，第四、第三居住面發現柱洞。其餘屋址都未發現柱洞。最上層的F1出現了以土坯砌牆。²² 以上兩處遺址，都顯示當時曾被人們長期反覆佔居。

建平水泉遺址，出土夏家店下層、夏家店上層與戰國燕文化三種遺存。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發現房址120座，窖穴灰坑107座。房址有半地穴式與平地起建的兩種。半地穴式房子中，也有貼碎陶片的柱洞。平地起建的房子有土坯砌牆，居住面由草拌泥與白灰面塗抹而成。石器中有鏟、刀、斧、鏃及磨棒、磨盤、石臼等與農業生產、製造有關的器物。²³ 水泉遺址的動物遺存，有豬、

¹⁹ 遼寧省文物幹部培訓班，〈遼寧北票縣豐下遺址1972年發掘簡報〉，《考古》3（1976）：197。

²⁰ 同上，198-200。

²¹ 同上，199。

²²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朝陽地區博物館文物組，〈遼寧建平縣喀喇沁河東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1（1983）：974-75。

²³ 遼寧省博物館、朝陽市博物館，〈建平水泉遺址發掘簡報〉，《遼海文物學刊》2（1986）：13-21。

狗、牛、羊，及鹿與齧齒類動物等動物遺骨。這批獸骨經動物考古學鑑定的結果：豬的馴養較早，夏家店下層早期的豬已是家豬。狗，至少到了中期也是馴養動物了。建平水泉所見狗骨，多為年青的個體，無年老個體，幼年的也很少，因此學者認為當時在大小凌河地區（以及老哈河地區），狗是被人類食用的動物。豬與狗在本區的馴養較早、較普遍，這些都與我們在老哈河流域所見相同。水泉遺址夏家店下層的牛，據動物考古學者稱，絕大多數可能都是野生的。羊的馴養，可能始於夏家店下層的晚一階段，或更晚一些。²⁴

北票豐下所出的石製工具有，鋤、鏟、刀（石鐮）、杵等農業用具，也有鏃、石片與刮削器等細石器。與這些生產工具相應的遺存有，成堆出土的碳化穀物，經鑑定為粟、稷，以及獸骨，其中豬骨最多，其次為羊、牛骨。在一個居址的門口，曾大量堆放豬骨與羊骨；這兩種，可能是馴養動物。²⁵

遺址標本經碳十四測定與樹輪較正的結果為：建平水泉，1882-1679 B.C., 2195-1935 B.C.；北票豐下1886-1681 B.C.。²⁶

豬與狗，在許多老哈河與大小凌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都構成主要動物遺存，顯示牠們是當時人類生態中最重要的動物。豬對於早期農人來說，有生態上的重要性。這是因為豬的掘食性，對於森林有相當的影響；當牠們在掘食各種植物的種子、初芽的樹苗、根莖，經過一段時間，林間的樹叢被清除，代之以草被。如此，在多森林的北歐，豬曾為銅器時代的農人創造便於農業與畜養草食類動物的環境。²⁷ 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遼西地區，便是這樣的富於森林、沼澤的環境。利用畜養豬，一方面當時的農民可得到可靠的肉食，另一方面由於豬在林中覓食時的「清除」作用，更多的林地被開發成農地，或變成草地，聚落便逐漸衍生。

²⁴ 張鎮洪，〈建平水泉夏家店文化遺址獸骨研究〉，《考古與文物》1（1989）：57-61。

²⁵ 遼寧省文物幹部培訓班，〈遼寧北票縣豐下遺址1972年發掘簡報〉，201-8。

²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數據集〉，66-68。

²⁷ M. L. Ryder, "Sheep", in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ed. by Ian L. Mason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68; Frederick E. Zeu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3), 262.

狗，在世界各文明中心都是最早被人類馴養的動物。由中石器時代以來，狗與人類便經常在一種合作的關係上；只有在極少的例子中，狗被作為人類的食物。雖然學者由動物考古學的證據，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的狗可能是人的肉食。但是我們知道，當時的農人們也畜養許多豬。豬不但要被驅離以免騷擾農地，為了在野外覓食，也需經常被驅趕往返。研究馴養動物的學者F. E. Zeuner曾指出，驅趕自我意志強而不易朝特定方向移動的豬並非易事，而自古以來人們經常藉重狗來幫忙控制豬群。²⁸ 因此，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發現許多狗骨，尤其是狗與豬骨構成當時許多人類聚落中的主要動物遺存，顯示當時人可能也曾利用狗來驅趕豬群。

由以上資料可知，西元前2100-1500年左右，大小凌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人群，與老哈河流域地區人群相同，基本上過著相當定居的混合經濟生活。在這種生活中，農業、畜養與狩獵都是重要的生計手段。在畜養方面，豬是最重要的牲畜；狗可能被用來打獵、牧豬，或也供肉食。由於狗、豬與人都是雜食性動物，因此豬與狗，特別是前者，與人在自然食物上處在競爭的地位。豬依賴人類消費剩餘的農業產品及副產品，或自然環境中的根莖、野果、菌類（人能直接消費的資源）。這也顯示，當時農產品與農業副產品有盈餘來轉換成動物性蛋白質，或是環境尚稱寬裕，人不用與豬競爭野生資源。到了晚期，馴養的羊可能也出現在當地的經濟生活中，代表人類開始以草食性動物來開發新的生計資源（草本植物）。

燕山地區

與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區類似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也往南分布到燕山長城地帶。重要遺址有，北京琉璃河、昌平雪山、蔚縣三關、天津圍坊、唐山小官莊、大廠大坨頭等。這些遺址的發掘報告大都非常簡略。但是，學者已指出，與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相比，這兒的地方特色為：罕見大型打製石

²⁸ Frederick E. Zeu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263.

器如鋤、鎬等物，也沒有殉牲的習俗，少見石砌圍牆，青銅器出現的要比遼河流域為多。²⁹

大廠大坨頭曾發現兩個「灰坑」，一坑有主室與側室，另一坑有柱洞，兩坑都可能是居住遺址。坑內出土有陶製網墜、彈丸，石製的刀、斧、鑿、鏃，及細石器的刮削器，並出土一件青銅鏃，以及馬牙與鳥骨。器物與殷文化同類器物有密切關係，因此被認為年代與殷代接近。³⁰

圍坊遺址中的二期文化遺存，發掘灰坑三個，半地穴式房基一座。時代約當商前期或中期(ca. 1650-1400 B.C.)。發現有石鏃、石刀、石斧、石矛，以及屬細石器的刮削器，數量很大。骨製的有骨錐、骨匕、骨鏃等，並出土銅刀兩件。陶器中有許多陶網墜。出土獸骨的數量很多，種類有牛、豬、鹿、麋、犬、魚等，其中牛、豬、鹿、魚較多。³¹

距以上兩遺址不遠的平谷劉家河，曾出土一商中期墓葬。出土銅禮器16件，以及小件銅飾物、玉器、金器等。其中有一金耳飾，是流行在本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的飾物，曾出於昌平雪山、唐山小官庄、北京房山劉李店，以及遼寧敖漢旗大甸子等遺址的夏家店下層遺存中。³²

偏處本區之西的蔚縣三關遺址，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系統的是第一與第二段遺存。生產工具主要被發現在第二段遺存，有石製的鏃、刀、斧、錘，骨鏃、骨鏃，以及屬細石器的石鏃。三關遺址夏家店下層遺存的碳十四測定數據，除兩例較早外(2458-2137 B.C., 2193-1680 B.C.)，大多數的年代都在1530-1100 B.C.

²⁹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來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見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鄒衡，〈關於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近文化的初步探討〉，《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4；張忠培等，〈夏家店下層文化研究〉，見蘇秉琦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58-78。

³⁰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發掘隊，〈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大坨頭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1966）：9-10。

³¹ 天津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天津蔚縣圍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0（1983）：881-86。

³²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文物》11（1977）：1-8。

之間。³³

燕山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比起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區的同類遺存，在年代上都偏晚。由大廠大頭坨及圍坊遺址的遺存看來，這一帶的人們的農業活動不如遼西地區，漁獵與畜牧是重要生計手段。他們獵取許多林棲性的動物如鹿、麋等，顯示在當地多森林、溪河的環境中，漁獵是比農業更可靠的生計手段。或者，因某些社會因素（如戰爭頻繁），使得他們從事累積勞力投資—延遲收穫的農業風險太大，不如從事付出勞力可立即得到資源的漁獵活動；擁有可移動又可立即消費的畜產，也較擁有不能移動、不能立即消費的農作物有利。由於代表一些有武裝侵略傾向人群的「北方青銅器文化」傳統，³⁴已出現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中，因此，這兒的人群因社會因素（戰爭）而疏於務農的可能性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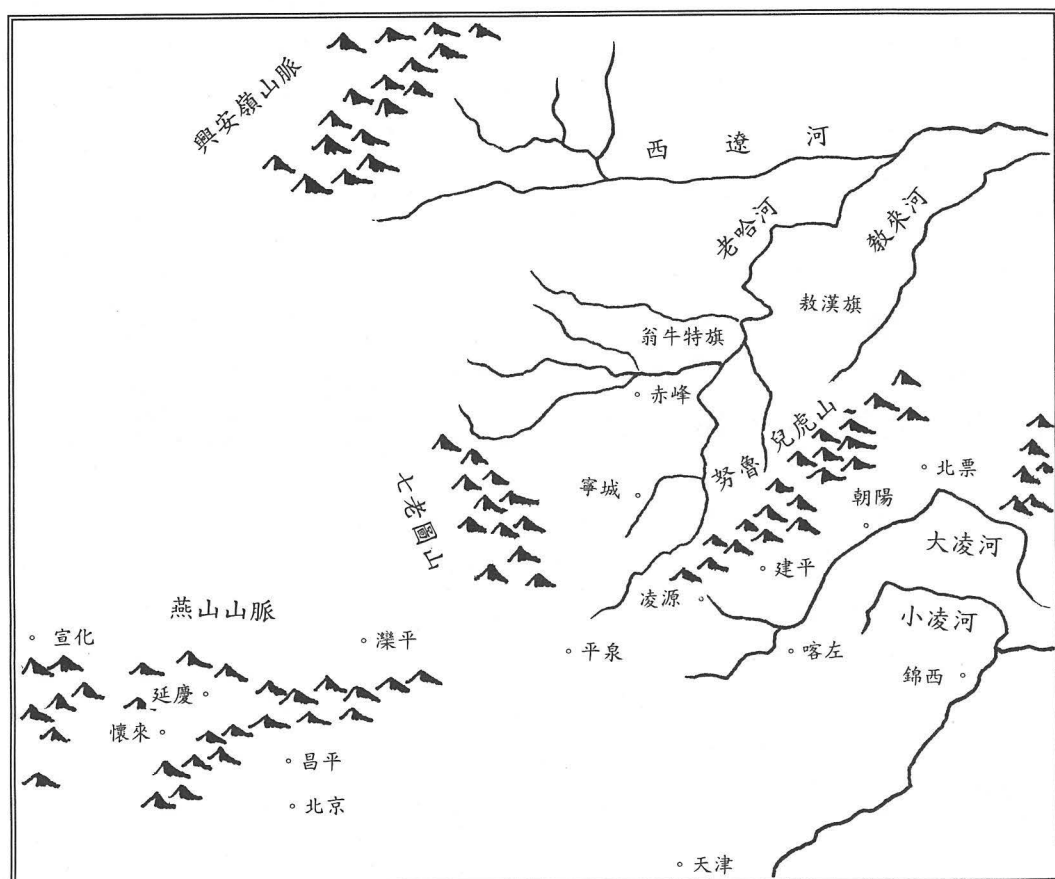
三、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

在老哈河與大小凌河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之上，常直接疊壓著夏家店上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布，北面越過西拉木倫河，東界在努魯兒虎山東麓，西南達燕山以南，中心區就在老哈河一帶（圖二）。時代約當西周到春秋，或戰國。到了春秋末戰國初，這兒的文化遺存又有些變化。以下我們依然分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與燕山南北等三區，探討當時的人類生態。

³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數據集》，25-27。

³⁴ 林滄，《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見蘇秉琦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29-55；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考古學報》3（1988）：257-75；江上波夫，《古代北方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48），7-10。

圖二 夏家店上層文化（含青銅短劍墓）重要遺址



- 重要遺址：1. 翁牛特旗大泡子；2. 敖漢旗周家店；3. 赤峰夏家店；4. 赤峰蜘蛛山；5. 赤峰紅山后
6. 寧城南山根；7. 建平喀拉沁河東；8. 建平水泉；9. 建平孤山子；10. 建平榆樹林子
11. 朝陽十二台營子*；12. 喀左和尚溝*；13. 喀左南洞溝*；14. 喀左老爺廟*；15. 錦西烏金塘*
16. 凌源三官甸*；17. 凌源五道河子*；18. 平泉東南溝；19. 天津園坊；20. 天津劉家攷
21. 昌平白浮；22. 延慶軍都山*；23. 宣化小白陽*；24. 懷來北辛堡*；25. 灤平炮台山*

老哈河流域

本區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的年代，大致不早於西周中期，而且能被斷代為西周中期的遺址很罕見。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遺址即為其一；該遺址地處老哈河西北18公里的沙漠中，在此發現有短劍2，刀2，陶器8件，及聯珠形飾及銅泡若干。³⁵

年代相當於春秋時期的敖漢旗周家地墓葬，位於老哈河右岸丘崗的北坡上。其西約700米有一與此對應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考古學者在此發掘墓葬54座，大多數墓中有木質葬具遺痕。在這些墓葬中，隨葬品大都是隨身佩帶的銅泡、銅牌、石珠，以及銅製武器，如銅刀、銅鏃、骨鏃等等，女性則隨葬紡輪。此外還隨葬狗、牛、馬頭及馬蹄。隨葬陶器很少，大多數墓主只在頭側放置一件。³⁶ 這些遺存的文化性質，顯示其為夏家店上層文化較晚階段的遺存。

赤峰地區相當西周春秋時期的遺存相當豐富，發掘報告較詳盡的遺址見於夏家店與蜘蛛山等地。夏家店遺址的上層文化中，發現有灰坑20個，居址5座，墓葬11座。這些居址座落在臨河的小山崗上，並築有石砌台階，可見當時聚落是建在相當陡峭的山坡上。這種聚落地點選擇，著重防衛性功能是相當明顯的。有窖穴式與地面建築兩種。窖穴居址兩處，平面都略呈圓形，其一底面中央有一柱洞。地面建築也有一柱洞，牆與居住面都是以黃土築成。在這兒發現的文化遺存，陶質粗，火候低，紋飾少，製作粗糙。石器有石斧、半圓形雙孔石刀、杵、臼，及石錘、石墜等。骨器有鏃、針、匕、錐、管、牌、珠與卜骨等等。遺址中發現有許多動物骨骼，經鑑定有狗、豬、羊、牛科、馬科、鳥綱等，其中以狗、豬為最多。墓葬有豎穴墓與淺槨墓。隨葬品以隨身飾物為主，包括銅扣、聯珠形及雙尾型銅飾、骨珠等，另外還有銅錐、銅刀、銅鏃、骨

³⁵ 賈鴻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銅短劍墓〉，《文物》2（1984）：50-54。

³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周家地墓地發掘簡報〉，《考古》5（1984）：417-26。

針、紡輪等工具。在5座墓中各發現一件陶罐。³⁷ 由生產工具及動物遺存看來，這應是農牧混合經濟人群的遺存。

赤峰蜘蛛山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發現有居住遺址2座，窖穴13座。居址F1是方形半地穴式，牆塗草泥，地面為不平整的灰土硬面。未發現柱洞及門道等遺跡。F2為窖穴式，底與牆都壘砌土坯，間填以黃土。陶器質粗，火候低。石器有刀、斧、錘斧等，及一件細石器。骨器有鏃、錐、匕、珠飾、牌飾等。動物骨骼有豬、狗、羊、牛、馬、鹿，其中以豬、狗骨較多。³⁸

赤峰紅山后墓地及居址，為早期日本學者所發掘。由於田野發掘的誤失，夏家店下層與上層兩種遺存沒有被分辨出來，而被統稱為「赤峰第二期文化」。但是此地所出的石棺葬，學者認為當屬夏家店文化較晚的階段，約在西周末到春秋初。³⁹ 這些墓葬中所出的獸骨有，犬骨8例，羊骨5例，牛骨3例，鹿骨2例，以及豬骨一例。並且，似乎是儀式性的以犬、羊，犬、牛，或犬、豬為組合殉葬。⁴⁰ 由這樣的動物殉葬組合來看，在此社會中，狗可能不同於對人類提供肉食的豬、牛、羊等動物，而幫助人們驅牧豬、牛、羊，反而是狗的主要功能之一。

寧城南山根遺址，位於高約500米的山坡上，據調查這兒有夏家店下層，夏家店上層，及戰國遺存。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遺存，1961年曾發現灰坑14個，墓葬9座。陶質粗，陶土似未經淘洗，火候不高。石器中有大型石器與細石器；包括半月型雙孔石刀與刮削器。前者是相當普遍的農業收割工具，後者則適於切割動物的皮肉。骨器37件，有骨鏃、骨鏟等。動物骨骼經鑑定有，豬、狗、牛、羊、鹿、馬、兔、狐、鳥類。其中以豬與狗的個體較多；豬，幼年與成年

³⁷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報告〉，111-43。

³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215-42。

³⁹ 朱永剛，〈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初步研究〉，見蘇秉琦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00-1。

⁴⁰ 濱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紅山后〉，東方考古學叢刊甲種第六冊，（東亞考古學會，昭和13年），22-23。

各半，無老年豬。碎骨中有許多長骨，可能經取髓所致。墓葬中，隨葬物以裝飾品爲多。女性（2座）隨葬紡輪、骨針及裝飾品，男性（3座）僅隨葬耳飾、串珠。三號墓出土的銅環上有騎馬追兔立雕，顯示馬已被用爲座騎。墓葬的年代，據推測相當春秋時期。墓葬填土中有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陶片。⁴¹

同一地點，1963年發掘一座夏家店上層文化石槨墓。與其它夏家店上層墓葬不同的是，此墓的隨葬品相當豐厚。青銅器總數達五百多件，其中數量最大的爲兵器，包括刀、劍、戈、矛、斧、簇，及盾與盔等護具，並出有馬銜。青銅容器有簠、簋、鼎、鬲、甗、杯、豆等。除了典型夏家店上層文化器物外，這兒也有中原文化的典型器物。這兒的遺存與附近的青銅文化，尤其是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有緊密的關係。由本地器物與中原同類器物的比較，學者認爲此約當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遺存。⁴²

研究者已指出，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與下層遺存的主要差別在於：（1）上層文化的製陶工藝遠不及後者，器形、紋飾及質地有明顯區別；（2）上層文化的石質工具中，主要是敲砸器與半月形石刀，缺乏下層文化中常見的鋤、鏟類的鬆土工具；（3）以動物遺存而言，上層文化所出獸骨較下層時期爲多，且出現了馬骨；其它動物骨骼與下層類似。⁴³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上層文化的聚落遠不如下層時期分布密集。居址的牆、居住面與柱洞的修築方式，不如下層時期精緻，也不見下層時期那樣的長期反覆佔居的情形。墓葬中，無論男女都盛行以小件的隨身裝飾品隨葬（或是衣物上帶有許多裝飾品）。男性常以戰爭器械，如劍、刀、盔、鏃等隨葬。

綜合這些考古學上的現象，顯示在西周春秋時期，老哈河流域人群的以農爲主的混合經濟生活有衰退的趨勢。下層文化時期長期定居，累積投資勞力於土

⁴¹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1975）：117-40。

⁴² 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考古學報》2（1973）：27-39。

⁴³ 劉觀民、徐光冀，〈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10。

地（使用大量的鬆土工具）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流行。在上層文化中農業變得較為粗放，鬆土工具消失，顯示在農業上所支出的人力減少。相對的，當時的人比較不定居，而畜產與隨身裝飾品較多。在農業上省下的人力，除了應付牧業之外，由隨葬武器看來，也用在防衛或掠奪性的戰爭上。這一切的變化，應與馬卓越的負載力與移動力被當時人所利用有關。

春秋以後，這兒的考古文化遺存被發現的很少。敖漢旗三道灣子遺址，除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外，據稱還有戰國時期的遺物。⁴⁴ 但是考古報告中，對這些零散的文化遺存，沒有作進一步的描述。赤峰蜘蛛山遺址，在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上層文化之上，有戰國至漢初文化堆積。⁴⁵ 由出土一千多枚鐵鋌看來，這是一個有軍事性質的遺址。大量的瓦類殘片，及體積相當大的陶器殘片，顯示這裡原有相當規模的建築，及相當定居的佔居者。出土遺物與中原區的同類器幾乎完全一致。這些遺存，以及英金河、陰河沿岸為數不少的規整夯土城障，⁴⁶ 都印証著文獻中的記載一戰國晚燕國勢力發展到老哈河流域，以及燕秦長城的建立。

大小凌河地區

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之後，本區西周早、中期的遺存發現甚少，大多為春秋至戰國時的遺存。這些遺存通常都被視為夏家店上層遺存。⁴⁷ 但是，事實上我們可將之分為前期（西周中到春秋）與後期（春秋末至戰國）兩種遺存；兩者在時代上的差異，以及人類生態上的差別，不能被忽略。

前期夏家店上層遺存，可以建平水泉的中層遺存為代表。在這文化層中，出土房址13座，窖穴灰坑31座，墓葬18座。房子為平地起建，圓形，牆為夯土或石質，居住面為硬土或紅燒土。有的窖穴內出碳化穀物，經鑑定有稷、粟兩個

⁴⁴ 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2（1977）：1。

⁴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230-42。

⁴⁶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的石城遺址〉，《中國考古學研究》，89-90。

⁴⁷ 遲雷，〈關於曲刃青銅短劍的若干問題〉，《考古》1（1982）：57。

品種。墓葬中，有些死者隨葬數量相當多的兵器，如銚柄曲刀劍、銅刀、銅斧、銅鏃，以及裝飾品，如銅泡、聯珠形銅飾等。另有些墓葬，事實上是利用廢棄灰坑埋入多具屍體的亂葬坑。這兒的石質生產工具有半月形石刀、斧、錘斧、杵、臼、磨盤、磨棒，並有各種的細石器。⁴⁸ 水泉遺址碳化穀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經樹輪校正）為 405-233 B.C., 351 B.C.—A.D. 49。⁴⁹ 這兒出土的銚柄曲刀劍，是曲刀劍系中較早的型式，年代最早的可到西周晚至春秋早。⁵⁰

建平喀拉沁河東遺址相當於春秋時期的遺存，也屬於前期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發現灰坑9個。出土的遺物中有半月形雙孔石刀、錘斧，及骨錐、骨棒等。另蒐集曲刀短劍一把，據稱出於一個土坑墓。⁵¹ 在建平孤山子、榆樹林子，也都發現隨葬曲刀短莖式青銅劍及其它兵器的墓葬，時代約在西周中到春秋晚之間。⁵²

本區的晚期夏家店上層遺存，幾乎只發現有墓葬。朝陽十二台營子第一號青銅短劍墓，是一座男女合葬的石槨墓。出土有兵器、馬具、裝飾品等。男性隨葬銅劍、銅斧、銅鏃等兵器，女性隨葬礪石、銅魚鉤及石網墜等物。報告中估計其年代，約當春秋晚或戰國時期。⁵³ 但是所出的短莖式曲刀劍，據分析為西周晚至春秋早的形式。⁵⁴ 與之相似的石槨墓也被發現在朝陽小波赤。同樣的，隨葬以兵器為主，有曲刀短莖式青銅短劍。年代據估計，與十二台營子遺存接近或略晚。⁵⁵

⁴⁸ 遼寧省博物館、朝陽市博物館，〈建平水泉遺址發掘簡報〉，《遼海文物學刊》2（1986）：21-25。

⁴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數據集〉，66。

⁵⁰ 遲雷，〈關於曲刀青銅短劍的若干問題〉，55。

⁵¹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朝陽地區博物館文物組，〈遼寧建平縣喀喇沁河東遺址試掘簡報〉，973-81，1003。

⁵² 李殿福，〈建平孤山子、榆樹林子青銅時代墓葬〉，《遼海文物學刊》2（1991）：1-9，77。

⁵³ 朱貴，〈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青銅短劍墓〉，《考古學報》1（1960）：63-70。

⁵⁴ 遲雷，〈關於曲刀青銅短劍的若干問題〉，55。

⁵⁵ 張靜、田子義、李道升，〈朝陽小波赤青銅短劍墓〉，《遼海文物學刊》2（1993）：15-17。

喀左和尚溝遺址的B、C、D點，都出有隨葬青銅兵器（以曲刀短劍為主）的墓。B點3座墓中的一座中有隨葬牛頭。D點的11座墓中有4座墓出獸骨，其中3座隨葬牛骨，一座隨葬羊骨。據估計，這些墓葬的年代約與南山根、烏金塘同時或更早；因此，約當西周晚至春秋時期。喀左南洞溝也發掘到含青銅曲刀短劍的石槨墓，時代約當春秋晚戰國初。⁵⁶ 喀左老爺廟出土的曲刀青銅短劍墓，則是豎穴土坑墓。時代略晚，約當戰國時期。⁵⁷ 類似的戰國曲刀青銅短劍墓群，也出於錦西烏金塘。

凌源三官甸墓群出土曲刀青銅短劍、環首刀，蛙形節約、虎形節約、馬銜、馬鐙，及動物形銅飾等。時代據估計在戰國中期。⁵⁸ 凌源五道河子清理古墓11座，其中一座石槨墓，其他都是豎穴土坑墓。墓底鋪上樺樹皮，隨葬數量不等的馬牙。隨葬品主要是兵器與裝飾品，不見陶器與青銅禮器。與本地其它遺址不同的是，這兒所出的刀、劍、戈，都屬於中原常見之物，不見曲刀短劍。但裝飾品中卻表現北方青銅文化，或當地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特徵。經器物風格比較，估計其年代在戰國中晚期。⁵⁹

平泉，地介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與燕山地區之間。在東南溝的黃窩子山，發掘石板墓及土坑墓共11座，其中只有4座有小件隨葬品。石板墓一般隨葬品很少，主要是骨珠、貝、銅泡、銅墜。土坑墓有兩座，出土銅圓牌飾、銅泡、銅刀、銅戈、銅短劍及骨珠等。時代約當西周末到春秋初期。⁶⁰ 這兒的銅短劍，已是燕山地區所流形的直刀而非曲刀式了。

在大小凌河地區，雖然由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戰國時期，都有以曲刀劍為特徵

⁵⁶ 遼寧省博物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喀左南洞溝石槨墓〉，《考古》6（1977）：373-75。

⁵⁷ 劉大志、柴貴民，〈喀左老爺廟鄉青銅短劍墓〉，《遼海文物學刊》2（1993）：18-21。

⁵⁸ 遼寧省博物館，〈遼寧凌源縣三官甸青銅短劍墓〉，《考古》2（1985）：125-30。

⁵⁹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凌源縣五道河子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2（1989）：52-61。

⁶⁰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平泉東南溝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考古》1（1977）：51-55。

的考古遺存，而且這些遺存都多少與「夏家店上層文化」有些關連，但在前期（西周至春秋中）的建平水泉遺址還有農業痕跡與居址，豬仍被人們畜養。到了後期（春秋戰國之交至戰國時期），見於報告的幾乎只有墓葬，罕見居址；豬骨被牛、羊骨與馬牙取代；在隨葬品中，陶器傳統沒落，而偏好隨身飾物；墓葬遺存中常見的武器與護具，顯示其墓主所處社會的強烈武裝傾向。這些考古遺存上的轉變，都說明在春秋戰國之交，這兒的人類社會曾經歷劇烈的變化。

燕山地區

本地區的西周遺存，最主要的是房山琉璃河的西都燕國都城及墓地遺址。⁶¹ 其它經正式發掘的不多；昌平白浮曾發掘一些西周時期的墓葬；天津附近的大廠大坨頭西周遺存，有西周系統的陶器，時代約當西周晚期。⁶²

在北京昌平白浮發掘的3座西周木槨墓，隨葬有豐富的中原及北方特色的器物。銅器主要有兵器、工具、禮器與車馬飾。另有陶器、石器、玉器與卜甲、卜骨等。墓室結構、葬式、腰坑殉狗，及大部份隨葬品都與中原西周墓相似。青銅短劍卻是內蒙、遼寧、河北北部一帶常見的北方文化器物。釘滿銅泡的靴子，曾見於瀋陽鄭家洼子春秋末到戰國初的墓葬中。鈴形器在內蒙、山西一帶發現較多。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整套戰爭工具（包括護具、武器與車馬具）的兩座墓，墓主一為中年男性，一為中年女性。⁶³ 有關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經樹輪校正）為：1389-1055 B.C., 1100-840 B.C., 相當於西周早期。

除了以上那些有中原或北方特色的貴族墓葬外，天津薊縣圍坊遺址第三期遺存，可代表沿續當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人類活動。在這遺址發現灶址一座、人

⁶¹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來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見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6。

⁶²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發掘隊，〈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大坨頭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1966）：11。

⁶³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地區的又一重要考古收穫—昌平白浮西周木槨墓的新啓示〉，《考古》4（1976）：246-58，228。

類骨骸兩具。出土工具有，陶網墜、石斧、石矛，細石器有鏃與數量較多的刮削器。出土獸骨有牛、豬、鹿、麋等。牛、豬骨數量較多。時代約當商、周之交到東周初。⁶⁴ 天津薊縣劉家坨遺址，發現半地穴式房址兩座，灰坑20個，與相當西周前期墓葬4座。遺址文化層厚達一米左右，出有石斧、石刀與銅鏃。陶器種類器形與圍坊三期遺存相同。⁶⁵

這些遺存顯示，商代早中期（夏家店下層文化）本區中以漁獵、畜牧為部份主要生業的生活方式，一直沿續到這個時代。但是隨後，約當西周晚或春秋戰國時，本區的北方與西北方出現較大的人類生態變遷。

北京延慶軍都山附近的玉皇廟、西梁堖、葫蘆溝等地，出土總數約500餘座的所謂「山戎墓」。這些墓葬中部份有殉牲，以狗最普遍，其次是羊，再其次是牛，最少的是馬。婦女殉馬比較罕見，兒童則多殉狗。殉牲數目多寡與種類，都有標示死者地位的意義。以隨身殉葬的裝飾品而言，除少數兒童外，幾乎都配一對耳環，頸下佩戴動物形牌飾，各種質料的項鍊多佩於死者胸前。武器類，如青銅短劍、銅削刀，多出於男性死者腰間。銅鑄、銅斧、銅鑿，多出於男性死者骨盆至足部間。銅鏃及骨鏃則置於膝部以下。隨葬的陶器，大多是製作粗，火候低。少數墓有青銅容器，這些容器大多來自燕或中原地區。墓地的年代，上限約在西周、東周之交或春秋初，下限到春秋晚，或春秋戰國之際。⁶⁶

這種出兵器、隨身裝飾品及草食類動物骨骸的墓葬，也見於宣化小白陽遺址。在這兒發現有灰坑11座及墓葬48座。主要遺存見於墓葬。墓葬隨葬品有陶器、兵器、隨身裝飾品與生產工具。兵器有青銅短劍、刀、鑄、斧與銅鏃、骨鏃等。裝飾品有銅泡、銅耳環、銅珠項飾，以及各種人面飾、連珠飾、管形飾

⁶⁴ 天津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天津薊縣圍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0（1983）：886-93。

⁶⁵ 韓嘉谷等，〈薊縣邦均西周時期遺址和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鑑198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94-95。

⁶⁶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隊，〈北京延慶軍都山東周山戎部落墓地發掘紀略〉，《文物》8（1989）：17-33。

及動物形牌飾等。在9座墓中發現牛、馬等牲畜的頭骨與腿骨。陶器質粗，火候不高。⁶⁷ 這些墓葬遺存的年代，約在春秋到戰國早期。灰坑內遺物以陶片為主，有少量的獸骨與半月形石刀等石器，其年代約當西周。

類似的墓葬也見於懷來北辛堡與灤平炮台山。北辛堡的墓葬，基本上分三層，葬具在壙底，其上是殺殉的馬匹與車馬器，最上是殺殉的牲畜。第一號墓，墓中有殉牲與殉人，以及大量的車馬器、車架、兵器、銅禮器，以及隨身裝飾物。墓主頸部有石珠串飾，腰間有銅劍、銅環首刀、礪石等。殉牲的種類有馬、牛、羊各十餘頭，另外在殉人旁有狗頭。在車架下埋有殺殉的馬，以馬頭與四肢為代表，現存9匹（原有10-12匹）。第二號墓，壙東角的殉牲有牛3、馬3、羊2，與狗、豬各一頭。壙東北另有馬、牛的頭、肢骨與兵器等遺存。這兩墓的年代都約當戰國時期。⁶⁸ 灤平炮台山的墓葬，也見有殉牲的習俗，在殉牲種類上有狗、牛、馬，其中以狗最多。其他隨葬品以兵器、車馬器、隨身裝飾物為主。

由以上各遺址的考古現象看來，平津西北的燕山山地一帶，由西周末或春秋初開始，出現了一些人群。他們的男人大多有武裝傾向（隨葬武器），一種直刃短劍經常就置於死者手邊，可代表他們最常用的武器。在殉牲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大型動物有牛、馬，小型動物有狗、羊，而殉狗的數量又明顯高於羊。豬在他們的經濟生態上消失或並不重要。而且只見墓葬，幾乎沒有發現遺存類似的居址。在墓葬中，也不見有任何與農業有關的遺物。隨葬陶器少，且製作粗糙。這都顯示，在春秋晚到戰國時期，這兒的人群經歷了與大小凌河地區人群類似的社會經濟變化，使得他們放棄許多不利於「移動」的文化因素（如養豬、長期居住的房屋、精緻的製陶業等等）。

相對於這些有青銅短劍及殉牲的墓葬，在北京懷柔城發現一批東周至漢代的墓葬。這兒的墓中沒有直刃短劍，沒有殉牲，隨身裝飾品少，陶器多。而且附

⁶⁷ 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宣化縣文化館，〈河北宣化小白楊墓地發掘報告〉，《文物》5（1987）：41-49。

⁶⁸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懷來北辛堡戰國墓〉，《考古》5（1966）：231-42。

近有與墓地關係密切的遺址。墓葬形式與出土遺物，與河南洛陽、鄭州，陝西關中一帶一脈相承。⁶⁹ 與前述燕山以北有青銅短劍的遺存並列來看，可以說一個顯明的文化性的、生態性的「邊界」已沿燕山地區形成。

四、商周之際至春秋時期的人類生態變遷

綜合二、三兩節所引的考古材料，我們可以對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與燕山地區，由新石器晚期到春秋時期的人類生態變遷，作一整體描述。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初(ca. 2100-1500 B.C.)，老哈河流域與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基本上是以農業與畜養、狩獵為主要生業，以此過著相當定居的生活。晚期密集的聚落，顯示在這一段時間內人口有相當的擴增；聚落外的石圍牆，也顯示因人口擴增而有強烈資源競爭，使得保護共同資源有必要。在西元前1500-900年之間，這兩地區的人類活動都有減少的趨勢。但是，在南方的燕山南北地區，與夏家店下層文化有關的考古遺存便沒有如此的中斷現象，而沿續到商末。雖然如此，生態遺存顯示，燕山南北的人類生計活動中，比起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區的人類生態來，狩獵佔有較大的成份。

在老哈河與大小凌河地區，考古學上人類活動減少的現象一直沿續到西周中期，隨後出現了所謂「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群。當時的人們依然種植作物，但水平已大不如前。他們對動物性資源的依賴增高；畜產中的草食性動物愈來愈重要。同時，他們的陶器製作相當粗糙，房屋的結構與居住面也較下層時期簡陋。墓葬中出現武器與護具。每一跡象，都顯示畜養草食類動物與定居、農業間的矛盾，以及可能因此帶來的社會不安。

為了解讀這整個考古所見的人類生態圖象，一個關鍵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那就是：在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由商到西周前期(ca. 1500-900 B.C.)間的「缺環」，所代表的人類生態含意如何？

⁶⁹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懷柔城北東周兩漢墓葬〉，《考古》5（1962）：219-39。

夏家店上、下層文化間的缺環

我們所謂由商到西周前期的考古缺環，事實上也就是夏家店上、下層文化間的缺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時代，由龍山晚期到早商時期；夏家店上層文化，目前知道的遺存年代都大致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戰國之交，尚無發現西周早期的遺存。因此，在夏家店上、下層文化之間的空白，大約即在商中期到周初這一時段。

在這一帶作研究的考古學者，大多了解這一缺環的存在。⁷⁰ 近年的一些考古發現，使得許多考古學者認為這個缺環已被填補。這些考古發現主要是：（1）克什克騰旗天寶同，林西大井古銅礦遺址，昭盟翁牛特旗敖包山，赤峰大西牛波羅，扎魯特旗霍林河礦區等地，多次發現的商周青銅器；（2）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發現的商末周初青銅器，以及（3）魏營子類型遺存。⁷¹

昭盟翁牛特旗敖包山，出土三件大型青銅器，一甗二鼎，鼎中盛滿棕色結晶礦砂。據研究者分析，在製作方法上，這些器物的鑄造都非常原始；銅液溫度低，流動差，因而形成多處缺液及補鑄；內外範的定位也與一般商器不同，而在鑄縫邊留下圓形疤痕。因此，學者排除此三器是從其他地區移來埋藏於此的可能。類似的銅甗，也發現在克什克騰旗天寶同，以及赤峰縣大西牛波羅。大西牛波羅所出的銅甗，也有與敖包山銅器相同的製造技術特徵。⁷² 扎魯特旗北部霍林河礦區，西接錫林郭勒草原，東接大興安嶺。這兒所發現的西周銅器，也是窖藏。其中一器有銘曰：「井姜太宰它鑄其寶簋子子孫孫永保用享」。⁷³

⁷⁰ 郭大順，〈試論魏營子類型〉，見蘇秉琦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79；喀左縣文化館，〈記遼寧喀左縣后玖村發現的一組陶器〉，《考古》1（1982）：109。

⁷¹ 郭大順，〈西遼河流域青銅文化研究的新進展〉，《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⁷² 蘇赫，〈從昭盟發現的大型青銅器試論北方的早期青銅文明〉，《內蒙古文物考古》2（1982）：1-2。

⁷³ 張柏忠，〈霍林河礦區附近發現的西周銅器〉，5-7。

克什克騰旗龍頭山遺址，位於背山面河的坡地上。相當於商末周初的遺存出於一座墓中（M1）。遺址西部有大型石砌圍牆，M1被埋在石牆基址下，因而年代晚於石牆。隨葬品有：穿孔礪石、直刃銅劍、銅斧、銅鑿、銅錐、銅刀、銅鏃、銅泡，以及聯珠扣等各種銅飾物。由直刃銅劍與銅斧的形式，以及層位關係，學者認為這個墓葬的年代接近於晚商，或不晚於西周早期。⁷⁴

林西大井古銅礦遺址，在西拉木倫河北岸20多公里處。在此發現了礦坑、房址、冶煉遺址，大量與採礦有關的石器，以及陶器、銅器等。依據出土陶器等器物，學者認為這個古礦址部份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這是一處採礦、選礦、冶煉、鑄造的聯合作坊。在動物遺存方面，遺址中發現有鹿、麕、野馬、野牛、狐狸、麝、熊、野兔，以及山雞等獸禽遺骨；家畜只發現有羊。這些野生動物的遺骨，顯示當時在這兒工作的人們主要以狩獵來維持生活。這遺址的時代上限約在商周之際，沿續到西周晚或春秋初。⁷⁵ 這個古銅礦的發現，以及遼西地區所出的商周時期青銅器，證明遼西地區人群有鑄造銅器的能力，以及悠久的青銅冶煉歷史。

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發現的商末周初青銅器，多系窖藏，附近大都發現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堆積。⁷⁶ 喀左山灣子出土的22件殷周青銅器，是出於窖藏。由形制、紋飾、銘文、徽記等方面看來，學者認為這批銅器不是成套的組合，而是由各處蒐集而來的「匯合體」。⁷⁷ 喀左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出於兩個窖藏坑。一號坑所出都是貯酒器，埋藏年代為周初或稍早；二號坑所出

⁷⁴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騰旗博物館，〈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龍頭山遺址第一、第二次發掘簡報〉，《考古》8（1991）：704-11。

⁷⁵ 林西大井遺址的碳十四年代測定：2700±100、2715±85、2720±90、2780±100、2795±85、2790±115。見，靳楓毅，〈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題〉，《考古學報》2（1987）：189。

⁷⁶ 劉觀民、徐光冀〈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7。

⁷⁷ 喀左縣文化館等，〈遼寧省喀左縣山灣子出土殷周青銅器〉，《文物》12（1977）：26-27。

爲可用於烹飪、盛貯的成套器物，埋藏年代約爲周初。⁷⁸ 雖然學者們嘗試由這些器物中特定的氏名與徽記，來判斷擁有者的國別歸屬，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事實上氏名與族徽的多樣性，顯示這些器物的來源還是多元的。海島營子馬廠溝出土的近20件銅器，也是出於窖藏，埋藏年代也約在周初，但部份器物的製作年代可能早到商代晚期。器物形制與修補情況顯示，它們仍是匯集而來的器物，而非專爲殉葬製作的成套禮器。⁷⁹

在海島營子所出器物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匱侯盂」；學者以此証明西周初年這裡已是燕國的疆域。⁸⁰ 唐蘭則以北洞一號坑的器銘，認爲喀左一帶是商代孤竹國的範圍。北洞二號坑器銘中的「曷」，也被認爲是商代活躍在這一帶的諸侯國。⁸¹

喀左附近發現的殷周青銅器窖藏，附近也經常發現一些陶器殘片。近年來，考古學者認爲這些陶器，以及其它遺存，可構成一「魏營子類型」文化。北洞溝窖藏附近，曾發現一些陶器遺存，數量少而殘缺。類似的陶器，整批被發現在喀左海島營子后玫村，距離出匱侯盂的馬廠溝只有兩公里。后玫村陶器，完整的即有19件。在陶器出土地點附近，未見居址、墓葬，因此這批陶器可能也是窖藏。⁸² 與這些陶器有關的遺址與墓葬，被發現在魏營子；有關墓葬也出土於和尚溝。魏營子9座墓中的兩座有隨葬品，包括銅盃、銅甲、鑾鈴、銅泡、獸面當盧、綠松石珠、金臂釧，以及可能爲車飾的羊頭飾物。遺址上採集到一些陶器殘片，未經正式發掘。墓葬的隨葬品，與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所出類似，兩者的墓槨結構也相同。⁸³ 喀左和尚溝的黑山下，曾發掘4座墓，此遺存被稱爲和尚溝A點。這些墓中的陶器，都有魏營子類型陶器的特色。陶器的火候

⁷⁸ 喀左縣文化館等，〈遼寧喀左北洞村出土殷周青銅器〉，《考古》6（1974）：370。

⁷⁹ 〈熱河凌源縣海島營子村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8（1955）：16。

⁸⁰ 喀左縣文化館等，〈遼寧喀左北洞村出土殷周青銅器〉，《考古》6（1974）：370。

⁸¹ 同前。

⁸² 喀左縣文化館，〈記遼寧喀左縣后玫村發現的一組陶器〉，108-9。

⁸³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遼寧朝陽魏營子西周墓和古遺址〉，《考古》5（1977）：306-9。

低，器壁厚，器形不規整。M1隨葬有陶鉢、金臂釧、銅卣、銅壺，壺內有海貝；M2爲女性，兩耳邊各出一銅耳環；M3隨葬陶鉢與豬前腿；M4隨葬陶鼎、陶罐，及一件石斧。⁸⁴ 銅卣、銅壺都是商末周初的形式；相同的金臂釧也見於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中期墓中。⁸⁵

至於魏營子類型文化遺存與前述殷周銅器窖藏間的關係，學者由地域分布、年代、伴隨出土的關係等，證明它們實爲同一人群的遺存。因此，他們認爲遼西地區商末到周初的考古文化缺環已被填補。

遼河地區，尤其是大小凌河地區，所發現的商周銅器窖藏及相關器銘、徽記，常被解釋爲周初燕國的勢力已及於此，或是在商末這兒已有與商關係密切的方國在此活動。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在魏營子類型文化時期，遺址的分布急劇減少，文化堆積也較薄，前一時期那種層層相疊的房址群也消失。我們也不能忽略這時期的「商周青銅器」，多出於窖藏，而且多爲蒐集品；這些現象都值得進一步探討。顯然，當地發生了一些變遷，使得人類對於環境資源的利用，由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的「密集」，而變成魏營子類型中鬆散的方式。如果我們認爲商周方國會存在於此，事實上在此並沒有發現任何可支持此種社會結構的生產力，以及象徵社會層化的構築與墓葬。而且，這些銅器的長期使用痕跡，也顯示它們在當地與在南方商周社會中，各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營子墓葬中所出的銅盔、銅甲，克什克騰旗龍頭山出土的銅武器，以及其他與「北方青銅器」有關的飾物如臂釧、銅耳環等，都顯示這時佔居在遼西地區的人群，與「北方青銅器文化」人群有關，是相當有侵略性、定居程度低的武裝人群。

魏營子類型文化所顯示的考古現象，對於我們解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消失，與夏家店上層文化的興起，以及相關的人類生態變遷，都有關鍵的重要性。問題也就是：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這地區人類生態上的變遷？劉觀民曾注意到

⁸⁴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縣博物館，〈喀左和尚溝墓地〉，《遼海文物學刊》2（1989）：110-11。

⁸⁵ 郭大順，〈試論魏營子類型〉，見蘇秉琦編，《考古學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86。

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低溫期，並以此解釋夏家店上、下層文化人群的變遷，他認為：「農業發達的居民逐步南徙，接踵而至的是農業發達水平較低下的北方居民，並且這一趨勢時緩時急地持續了兩千多年」。⁸⁶ 氣候變遷，的確可能造成人類的大規模的長程遷移。但是以此解釋夏家店上層文化中農業的衰退，卻是不足的。因為，即使是長程遷移而來的人群，我們也應考慮他們如何適應新的環境，而不是堅信他們必然使用從前的生產技術。因此，無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群有多少是由北方遷來的，更重要的問題應是，當地人（無論是當地土著或是遠近移民）如何對於新環境（氣候變遷與政治變遷）產生新適應。

夏家店下層晚期的氣候變遷

商周之間，整個遼西地區人類活動的減少，可能與發生在商末周初的氣候變得乾冷有關。許多學者早已指出，發生在西元前2000-1000年左右的全球性的氣候變遷，曾在世界各地造成人類生態變遷。⁸⁷ 在華北，與此相關的氣候變化，也被中國學者在環境考古與歷史資料中證實。⁸⁸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考古資料，也顯示該地區絕大多數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都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停止被人類使用，而留下近1000-1500年的考古空白。⁸⁹ 這段人類活動的空白，也間接證明了這個環境變遷對人類生態的影響。關於遼西地區商周之際的氣候變遷，直接的證據來自動物考古學資料。以建平水泉動物遺存對自然環境的研究，顯示在早期濕暖期(ca. 2100-1500 B.C.)中，這兒是山林茂密，水草豐盛之

⁸⁶ 劉觀民，〈西拉木倫河流域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分布區域的變遷〉，56。

⁸⁷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95.

⁸⁸ 此既竺可楨等古氣象學者所謂的第一寒冷期，或商末周初低溫期。見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收於《竺可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陳賓寅編，〈中國自然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9-17。

⁸⁹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1994）：379-95。

地。後來，由於氣候乾燥，本地區成了一個乾燥草原或疏林草原。這個新的環境，主要形成於西元前1000年左右。⁹⁰

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被停止佔居之前，普遍出現有防禦性構築的聚落；顯示不利農業的氣候，使得當地人群間的資源競爭趨於激烈。同樣功能的構築，也被發現在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中；這就是在赤峰東山嘴、寧城小榆樹林子，以及英金河、陰河流域所發現的成群石城。根據在英金河、陰河流域的調查，這類石城都分布在河流兩岸的山崗上。山崗形勢險峻，經常是面臨深溝峭壁，背依高峻山嶺。這些石城分布密集，且相聚成群。每群中都有些城址明顯的較其它為大。另外，以夯土築圍牆的例子，見於敖漢旗大甸子遺址，這個聚落遺址圍牆外還有壕溝。有關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許多分期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我們難以證明防禦性聚落只在晚期出現。但是，至少敖漢旗大甸子遺址的碳十四測定年代為1685-1463 B.C., 1735-1517 B.C.，在這地區，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晚期遺存。寧城小榆樹林子遺址，出現銅刀，也被認為是殷商到西周的遺存。⁹¹ 這些資料都顯示，在殷末周初遼西地區人類活動減少之前，在當地似乎也經歷了由於生存資源緊縮，而使得以防禦性聚落來保護共同資源相當必要。

這個氣候上趨於乾冷的變化，在華北不同生態區中都造成相當影響，只是在程度與時間上有差異而已。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在西元前2000年之後，造成人類活動減少；延續最長的遺址，朱開溝，也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停止被人類使用。⁹² 在河湟地區，雖無明顯的人類活動中斷跡象，但在西元前1700年以後，以農業、畜豬為主的齊家文化經濟生態，被以畜羊、缺乏居址遺存為特色的辛店、卡約文化生態取代。⁹³ 而在本文的例子中，以農業為主的夏家店下

⁹⁰ 張鎮洪，〈建平縣水泉夏家店文化遺址獸骨研究〉，62-63。

⁹¹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寧城縣小榆樹林子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2（1965）：621。

⁹²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375-434。

⁹³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chapter 2.

層文化生態，對於這波乾冷化的環境變遷的抵抗力較強，但到了商末周初時，整個人類生態體系也不得不崩潰。而新的適應可能包括，一方面向南方爭奪較適於農牧之地，一方面尋求新的生計，以進一步利用從前無法利用的環境資源。商周青銅器窖藏出現在遼西地區，以及夏家店上層時期，牛、羊的牧養逐漸重要，便是這兩方面發展的部份反映。

周初封燕

周初，武王封召公於平津一帶。一直到戰國之前，燕是個默默無聞的弱國。在歷史記載中，燕山南北與遼西地區早期有孤竹、無終、令支，較晚又有山戎、東胡等人群在此活動。

考古資料所見，召公封燕前，燕山南北地區的情形如何呢？當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在北方逐漸消失，或為魏營子類型取代時，在燕山南北地區這個文化的當地類型卻有持續的發展。在器物學上，燕山以南的這個文化類型被認為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一支。但是在人類生態上，這兒卻與遼西地區有相當的差別；農業活動不如遼西地區密集，而更依賴多元的自然資源，如捕魚、打獵與畜牧等等。在動物遺存上，牛、豬骨較多，也顯示當地特色。在銅器上，這地區的人們常同時擁有殷式的青銅器，與屬於北方青銅器的小件銅飾物。在前面，我們曾由這些生態遺存與器物遺存（北方青銅器），說明當時這兒的人可能受到頻仍的「戰爭」影響，而較依賴漁獵、畜牧。

周人封燕，在此建立政治據點後，在考古遺存中出現許多中大型周人墓葬，反映此史實。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太保壘蓋銘文，記錄當時周王授民六族給燕侯，一同前去收受土地人民等史事。這六族中，據學者考證，有殷遺民，也有西方與北方的方國，如羌方、馬方的部族。⁹⁴ 在考古所見的西周貴族墓中，隨葬品常混合了商周式與北方青銅文化器物。至於一般平民的聚落，在燕國勢力

⁹⁴ 尹盛平，〈新出太保銅器銘文及周初分封諸侯授民問題〉，見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西周史論文集·上》（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19-30。

範圍內，至少有部份人群仍然是漁獵、畜牧與農業並重。不同於遼西地區以豬、狗爲主的畜養業，這兒的人們經常利用的動物以豬、牛爲主。在中國古文獻中，有商人的祖先「喪牛於易」的記載。⁹⁵ 有易，或易水，一般認爲就在河北偏北的地方。因此考古與文獻資料都顯示，牧牛業在河北北部人群的生計中，有長遠而重要的發展。

由這些資料看來，周人封燕後，並沒有立即造成顯明的文化邊界分隔燕山地區與遼西地區。在考古遺存上，商周式器物（包括燕國的器物）出現在遼西地區，而北方青銅器也經常出現在燕國貴族墓中。在中國文獻中，封燕之後，召公之下九世燕主之名都失載了；有關西周時期燕人活動的記載也很少。這或者顯示，燕國與遼河流域人群的往來較密切，這種地域性的活動，容易被後來的華夏遺忘。華夏與夷狄的政治、文化與族群邊界，要在西周中期到戰國時期才逐漸形成。

夏家店上層文化人群的適應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商周之際遼西地區人群所面臨的新環境是：一方面氣候的乾冷化使農業凋敗；另一方面，燕山南部地區出現了新的統治人群——以西周政權爲後盾的燕國。在此情況下，一個明顯的人類生態調適，表現在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中。

西周中期之後，雖然遼西與燕山地區的人類遺存都被稱作「夏家店上層文化」，但兩地在人類生態上的差別卻值得注意。老哈河地區，在西周春秋時期，當地人群的農業衰退，不再長期定居。在農業上釋出的人力，被用在畜牧與掠奪上。他們畜養的動物以豬、狗爲主，羊與牛也很重要，馬在此時也成了馴養動物，並被用爲座騎。在大、小凌河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群對環境有類似的調適。雖然當地人群仍種粟、稷，但對動物的依賴增加，而且，馴養動物的種類也有變化。喀左和尚溝墓葬中的隨葬獸骨顯示，牛與羊在當時人類

⁹⁵ 《周易·旅》；《楚辭·天問》。

的生計中成為最重要的動物。利用草食性的牛、羊，將人類不能直接消化的草資源變成動物性蛋白，這是人類在經過商周間的挫折後，能夠再度密集的利用此地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燕山地帶，由商周到春秋時期，當地人群在農業與畜牧之外，始終有活躍的漁獵活動。

整個來說，遼西與燕山地帶在夏家店上層文化中，農業水平降低，而對動物性資源的依賴增加。有些學者因此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代表人群，是由北方南下農業較落後的民族。⁹⁶ 但是，我們應注意夏家店上層文化人群的墓葬中，經常隨葬許多武器與護具。這些戰爭工具，顯示資源的匱乏使得掠奪或保護在當地的生態體系中都是必要的。而在戰爭頻繁的年代，農人傾向於以移動性的、可立即消費的漁獵、畜牧自給，而避免定居的、長期投資的農業活動。中國文獻中曾記載，在漢魏間的世亂結束後，地方官曾以沒收民間漁獵之具來逼不定居的人民重歸農耕。⁹⁷ 這也顯示，人類經常放棄農業、定居，以適應環境的變遷。因此，如果我們將考古上一個農業較發達的文化被農業落後的文化取代，當做是人群遷移的結果，顯然是將問題簡化，而忽略了人類對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適應能力。

五、西遼河流域遊牧業的形成

在中國歷史上，西周因戎禍而亡，由此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時期，在諸侯國間一個主要的政治活動就是「尊王攘夷」。在尊王攘夷的過程中，華夏的集體意識逐漸被強化。北方華夏諸國一面吞併或驅逐「戎狄」，一面各築長城以保護南方的資源。⁹⁸

⁹⁶ 劉觀民，〈西拉木倫河流域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分布區域的變遷〉，56。

⁹⁷ 《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記載鄭渾的功績曰：「天下未定，民皆剝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

⁹⁸ 王明珂，〈周人的族源與華夏西部族群邊界的形成〉，《大陸雜誌》87.2（1993）：1-20；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412-17。

在燕國方面，《左傳》中記載，春秋時山戎伐燕(664 B.C.)，齊國出兵伐山戎救燕。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戰國時：

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

到了戰國晚期：

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因此，在考古遺存中，孰爲山戎，孰爲東胡，或者東胡與山戎是否爲同一民族，都成了學者們研究、爭論的主題。在本文中我們關注的焦點是人類生態變遷，因此我們的問題是：以漢代遼西地區鮮卑、烏桓的遊牧爲代表的專化遊牧業，自何時開始出現？

春秋時期，可能是這個人類生態變化的關鍵年代。遼西與燕山地區，春秋至戰國的考古遺存，主要表現在一些青銅短劍墓上。老哈河流域，這時期的考古遺存很少。在大小凌河地區，在朝陽十二台營子、小波赤，喀左南洞溝、老爺廟，錦西烏金塘，都發現有類似的青銅短劍墓。凌源三官甸墓葬中的馬銜、馬鐙，以及五道河子墓葬中以馬牙殉葬，顯示在戰國時使用曲刀短劍、環首刀的墓主，更能有效的掌握對馬的使用，因而也在文化生態上人與馬有更親密的連繫。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報告中，都未見有關居址的報導。

在燕山一帶，也出現類似的人群。延慶軍都山、宣化小白楊、懷來北辛堡與灤平炮台山，都發現他們留下的（直刀）青銅短劍墓。在墓中流行以動物殉葬；這些動物，以馬、牛、羊、狗爲主，除了個例外（北辛堡二號墓），基本上沒有豬。在這些墓葬中，出土陶器少，且質地粗糙；沒有發現農業工具，也沒有發現居址。

以上燕山地區與大小凌河地區的青銅短劍墓，以及相關的遺物、動物遺骨，顯示可能早在春秋時期開始，在所謂「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範圍內，另一波的人類生態變遷在蘊釀中。到了春秋晚至戰國時，這個生態變遷明確化了。那就是，老哈河一帶的人群活動痕跡減少，而大小凌河與燕山北麓一帶人群的「武裝化」傾向愈來愈強；人們對於草食性動物的依賴也愈來愈重，尤其是對於

馬的馴養駕御技術已成熟而普及。利用馬在戰爭與控制其他動物上，可增加機動性並調節家庭人力的運用，這對於草原或森林草原遊牧業的產生，有決定性的影響。相對的，農業與養豬在人類生態上已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定居已無必要，而經常遷移。「遷移」，對於「武裝化」與畜養草食性動物的人群而言，是一項有利的社會因素。

另一個與遊牧業產生有關的技術，就是利用馴養動物的乳。關於這一點，在我們所探討的地區，尚無基於動物考古學方面的研究。但是，果如考古遺存所見，燕山與大小凌河地區的青銅短劍墓人群，是不定居而主要依賴馴養動物為生的人，那麼他們應該知道利用動物的乳。因為沒有任何近代遊牧民族能只依賴動物的肉維生；只有當人類知道利用動物身上生生不息的「利息」（乳），而避免吃「本金」（肉）時，遊牧經濟才可能發生。

最後，在這些地區的遊牧化過程中，狗的地位不能被忽略。由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到春秋戰國時期，狗在遼西與燕山地區人類生態中，都扮有重要的地位。在前面我們曾推測，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牠們曾被用來幫忙驅趕豬。後來，在夏家店上層文化中，由前述赤峰紅山后獸骨遺存所見，牠們也被用來驅趕草食性動物；當時馬的利用尚未普及，因此在控制草食動物方面狗有相當的助益。後來，在春秋晚到戰國的青銅短劍墓流行時，馬的馴養與利用已相當普及，但狗在考古遺存中仍佔重要地位。甚至到了漢代，活動在西遼河地區的烏桓、鮮卑人，死後仍要以狗殉葬，希望以狗牽引亡魂歸於「赤山」。⁹⁹ 在馬被用在遊牧後，狗在本地區人類社會中的功能，可能是狩獵中的助手。漢代遼西地區的烏桓、鮮卑，薩彥—阿爾泰地區的堅昆，貝加爾湖附近的丁零，以及許多後來在這些地區遊牧的人群，都經常在林中獵皮毛動物出售。¹⁰⁰ 在近代多森

⁹⁹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90/80。

¹⁰⁰ 《三國志集解》引《魏書》稱鮮卑產「貂、豹、鼯子，皮毛柔糯，故天下以爲名裘」。這些林中動物，顯示當時鮮卑活動的生態區有相當豐富的森林。有關薩彥—阿爾泰地區的森林草原遊牧，見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ns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林的東突伐地區中，狗是當地人狩獵中不可缺的助手，¹⁰¹ 這是森林草原遊牧人群的特色。

由東胡到烏桓、鮮卑

以上所述戰國時遼西、燕山地區使用青銅短劍的人群，是否已是遊牧的人群了？關於這問題，我們可以說，以「遷移」與「依賴草食性動物」而言，戰國時遼西燕山地區的人群已經「遊牧化」了。但是，除了這兩項基本要素外，遊牧生計中還包括必要的輔助性生業，以及與此配合的社會組織；就是這些（遊牧、輔助性生業，與特定的社會結構），使得每一種遊牧經濟，都成為對某種自然與社會環境的專化適應(specialization)，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專化遊牧業」(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戰國時的東胡，毫無疑問是燕國以及早期匈奴的主要對手。戰國時燕北使用青銅短劍的人群，應有相當一部份落在漢代中國人所謂「東胡」的範疇中。與匈奴相爭的東胡之主，在中國史料中稱「東胡王」；燕將秦開，在戰國末曾作為東胡的人質。這都顯示，當時被稱作東胡的早期遊牧人群，是集結在有相當規模的、中央化的(centralized)政治組織之下。考古遺存中，我們在第三節中曾提及，夏家店上層文化有些墓主擁有相當豐富的隨葬品，包括武器、銅禮器、車馬器與飾物等等；在建平水泉、朝陽十二台營子都見到此種墓葬。懷來北辛堡一號墓葬中隨葬品之豐盛，尤為讓人驚異；三層殉葬物中，包括殉人與殉牲，以及大量的車馬器、車架、兵器、銅禮器，以及隨身裝飾物等。在較早的寧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中，更出現有500多件銅器殉葬的例子。顯示在當時的社會中，這些墓主有支配大量財物與人力的優越地位。這樣的社會地位，不是遊牧「部落」首領所能企及，而應產生於更中央化的政治組織，如曾

¹⁰¹ 在突伐地區，東部多森林，是馴鹿遊牧、獵人與森林草原遊牧人群的天下；西部為草原，是草原遊牧人群活動的地方。據研究者調查，東部地區的突伐人擁有的狗，比西部人擁有的為多。這也顯示狗在森林草原遊牧生態中的重要性。見，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174.

邦(chiefdom)或國家(state)。¹⁰² 考古遺存中他們「武裝化」傾向，顯示在此政治組織下，他們以對燕國北境的掠奪做為主要輔助性經濟生業。燕國築長城以拒胡，便是對此的反應。

烏桓與鮮卑，都被漢代中國人認為是東胡的後代。烏桓與中國有密切的接觸，大約始於西漢武帝時(119 B.C.)，中國將他們遷到五郡塞外（也就是燕山山地與大小凌河流域），為中國防範匈奴。鮮卑與中國的接觸更晚；西漢及其以前的史書對他們沒有記載。¹⁰³ 東漢初，他們活動在西遼河流域。關於他們的遊牧生活，《後漢書》對烏桓有以下記載：

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

鮮卑的遊牧生活，據載與此類似。

也就是說，他們沒有「中央化」的權威，沒有「徭役」。部之下，為各自遊牧的邑落。部大人的地位不是由繼承得來，而是平時排解糾紛，戰時為軍隊領袖，因此以個人聲望受眾人推舉。由於沒有固定稅收，領袖地位並不能為其帶

¹⁰² 在牧產商品化以前，或是遊牧經濟較少依賴外來資源（貿易或略奪）的情況下，許多遊牧部落內部經常是相當平等的。這是由於人群的移動性，以及財產的性質（動物），使得（1）財富不易累積也不宜累積，（2）領袖不易對人民行使強制性威權。因此，部落首領可能富於畜產，也可能得到人民的忠心，但這都不是永久的。他必需經常慷慨，才能得到部眾的支持，而且這種建立在個人關係上的忠誠，無法傳給下一代。因此遊牧部落中的領袖，其社會、政治與經濟地位遠不如酋邦，或國家等階層化社會中的領袖。有關遊牧社會是否平等化，在何種條件下較趨於平等化或階層化的問題，見Gudrun Dahl, "Ecology and equality: The Boran case,"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ed. by L'Equipe écologie et anthropologie des sociétés pastora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61-81; 及同書有關論文。關於部落與酋邦等不同人群的「領袖性質」(leadership)的不同，Marshall Sahlins 對此的探討對我很有幫助。見，Marshall D. Sahlins, "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 (1961): 323-27; *Stone Age Economy*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 1972), 206-10.

¹⁰³ 林幹，《東胡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78。

來財富；相反的，領袖必須慷慨，才能以此得到部眾的效忠。因此領袖的個人成就，無法傳給後代。這是典型的以分散、平等自主為特色的游牧部落結構。¹⁰⁴ 在有關鮮卑、烏桓的考古遺存中，我們也可以見到同樣的現象。

吉林榆樹老河深，曾發現東漢「鮮卑墓」128座。隨葬品男性較多，女性較少。男性隨葬兵器及馬具，如劍、矛、鏃、箭囊、馬銜等；女性則隨葬銀質或銅質腕飾。隨葬品較豐富的女性墓主，主要是隨身的小件裝飾物較多。隨葬豐的男性墓主，則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成套的銅鐵武器與馬銜、馬鏟，以及銅神獸牌飾、銅環、帶鉤、耳飾等等。¹⁰⁵ 由於資料並未全部發表，我們不清楚在墓葬中是否有明顯的階級等差。通榆興隆山鮮卑墓葬與內蒙古完工古墓，都是多人集體葬，以陶器、小件裝飾品與馬、牛、羊骨隨葬。因為多人葬，沒有隨葬厚薄之別。¹⁰⁶ 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的東漢墓葬，共有20座。其中有12座墓發現有動物骨骼；包括馬、牛、羊、狗骨，而以羊骨最多。墓葬有單人葬、雙人葬與多人集體葬等方式。一般來說，雙人葬與多人葬的隨葬品較多。單人葬有時也有較多的隨葬品，如M11，隨葬有小鐵刀1、銅指環1、大銅鈴4、銅管狀飾品16、羊距骨1、單孔珠4、羊腿4。¹⁰⁷ 這些豐富的隨葬品，事實上也只是些隨身財產。

內蒙扎賚諾爾古墓，約有300餘座，全是單人葬。大部份木棺外的兩側埋著牛頭或馬頭。隨葬陶壺罐等放在頭頂部或兩側，個別墓中的陶罐底部還有羊距骨，這類墓中多出有馬、鹿等動物紋的銅牌子。其他隨葬品還包括成串的小珠、樺樹皮圓牌及弓囊、鐵鏃、環首鐵刀、馬銜、帶扣、手鐲、戒指等等。由

¹⁰⁴ 研究烏桓的前輩學者馬長壽先生，稱早期烏桓的社會為「邑落公社」，也是強調此社會在階級分化前的平等特質。見氏所著：《烏桓與鮮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18-22。

¹⁰⁵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長春市文管會、榆樹縣博物館，〈吉林榆樹縣老河深鮮卑墓群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1985）：68-82。

¹⁰⁶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簡報〉，《考古》6（1965）：273-83；吉林省文物工作隊，〈通榆縣興隆山鮮卑墓清理簡報〉，65-69。

¹⁰⁷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的遺址和墓葬〉，《考古》1（1964）：36-53。

清理出的31座墓的隨葬品組合看來，厚薄差距只表現在這些生活用品與隨身飾物的種類與數量上，並沒有象徵社會階層分化的大型墓葬與豐厚的隨葬。¹⁰⁸ 以上這些漢代內蒙古東部或東北地區的遊牧人群墓葬，無論是否為鮮卑、烏桓遺存，都與戰國時期燕山與大小凌河地區的「青銅短劍墓」有相當的不同。前者普遍隨葬生活用品與隨身飾物，主要只有數量上的差別；後者的大墓中，則有許多象徵強制式權威(coercive power)的銅禮器、人殉、車架等物。

漢代在部落結構中的遊牧社會，與「東胡」、匈奴等較集中化的遊牧群體另一點不同的是，他們並不十分依賴掠奪中國作為主要輔助性生業。或者，掠奪對他們而言，只是季節性的輔助生計之一。在《後漢書·烏桓鮮卑傳》中，鮮卑對中國的「侵邊」有季節可考的有16次，在其首領檀石槐之前的9次都發生在秋冬；在檀石槐時期有7次，冬、夏各3次，秋季一次。¹⁰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檀石槐之前鮮卑對中國的劫掠，是有季節性的、配合遊牧韻律的生計性劫掠(subsistence raids)。這種劫掠的規模小，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不高。相對的是，匈奴國家層次不分季節的對中國掠奪，這是「策略性劫掠」(strategic raids)。¹¹⁰ 在檀石槐統一鮮卑各部後，這時鮮卑才採匈奴對中國不定時劫掠的策略。也是從檀石槐起，《後漢書》記載，鮮卑各部大人開始世代相襲。由傳統鮮卑社會到檀石槐時的變化，也顯示遊牧部落與酋邦或國家層次遊牧社會的不同。

由這些記載看來，在檀石槐之前，也就是鮮卑匈奴化之前，鮮卑與烏桓的政治社會結構基本上是相當「分散化」(segmentary)與「平等化」(egalitarian)的。這是許多遊牧部落的特徵，也是更早期的東胡所缺乏的。可以說，東胡與烏桓、鮮卑，是西遼河一帶「遊牧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農業定居社會中，人群的政治結群發展常是「由部落到國家」。而在遊牧社會中，這個規則不一

¹⁰⁸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扎賚諾爾古墓群發掘簡報〉，《考古》12（1961）：673-80。

¹⁰⁹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90/80。

¹¹⁰ 王明珂，〈匈奴的遊牧經濟—兼論遊牧經濟與遊牧社會政治組織的關係〉，33-35。

定被遵循。在東胡的階段，早期遊牧人群因受定居人群的影響（或因循當地舊傳統），曾組成類似「酋邦」或「國家」的集中式政治組合。這就是中國文獻中，東胡王所領導的東胡。但是，在南方燕國建長城，強力爭奪、保護本身資源，在西方東胡又受挫於新興的匈奴後，東胡這種較集中式的政治組織解體。當地的遊牧人群，無論是否原屬東胡，最後發展出「分散化」與「平等化」的遊牧部落組織。在西漢時，烏桓被移到漢帝國邊界，難免與漢代中國有密切的往來。但中國對於西遼河流域的鮮卑幾乎毫無所知，這也顯示在這樣的遊牧經濟與社會組織下，他們能過著基本上與中國關連甚少的遊牧生活。

我在一篇分析匈奴的遊牧經濟的論文中，曾以匈奴的例子來說明俄國民族學者A. M. Khazanov的觀點：基本上遊牧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不能自足的(non-autarky)；它不能離開輔助性的經濟活動，也不能脫離爲了克服經濟的單一性所從事的政治與社會活動。西遼河流域的例子顯示，在專化遊牧業的發展過程中，人群政治社會結構也有一發展的過程。由中央化轉爲分散化與平等化，可說是當地遊牧人群進一步對遊牧生態的專化適應。

基於以上的資料與探討，我們或能重建西遼河流域與燕山山地部份地區人群逐漸走向遊牧化的過程。在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因人類的農業與畜豬對森林有清除作用，使得草地日增，也使畜養草食性動物成爲可能。到了晚期因氣候乾旱化，不利於農業發展，人類活動減少，並有武裝化傾向。在經過商周間的調適期之後，人們重新利用這地區。起初雖然他們仍行農業，但同時畜養更多的草食動物；因草食動物需要草場，因此每一人群所需的生態區，都較下層文化農業社會所需大了許多。這個結果造成人群間的衝突，也造成進一步的武裝化。武裝衝突造成更多的人群不願從事農業生產，而依賴畜牧、漁獵與掠奪。在此情況下，「移動」是一種避免風險，而又有利於經濟活動的選擇。最後，在這過程中尾聲中，南方華夏意識的形成與強化，給予本地區走向遊牧化的最後刺激。華夏強力的維護本身資源，使得北方人群全面遊牧化。並且，這些遊牧人群調整其社會政治組織，以適應新的局面。

六、結論：生態變遷與華夏邊緣的形成

探討夏家店上、下層文化嬗遞的學者，常以人群的遷移來解釋考古文化的變遷。研究東胡、鮮卑、烏桓的學者們，也經常從文獻、考古材料來追溯他們的起源與遷移過程。這樣的研究，皆認為「民族」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人群，他們在時間與空間的分布，乃由於在時間中的繁衍傳承，與在空間裡的遷徙。在同樣的思考方式下，有關華夏的「起源」，如商人、周人的起源與遷徙問題，也一直是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關心的焦點。

毫無疑問，人群經常在空間中作大小規模的群體遷移。但許多民族誌資料顯示，族群身份變遷或新族群形成經常在發生，而最常發生的背景原因就是「遷徙」。¹¹¹ 因此，以重建遷徙過程，來為一個族群溯源，事實上都忽略了在這過程中人群的認同變遷問題。近年來的族群理論發展，使我們對族群現象有許多新的認識。族群經常被認為是主觀宣稱的人群範疇，這個人群是由共同的「異族意識」來設定邊界，以「集體歷史記憶」（共同起源）來凝聚認同。¹¹² 在此認識下，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便是：華夏（中國人）的邊緣，在何時形成？以及如何形成？

在遼西、燕山地區的例子中，由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殷商時期，並沒有顯明的華夏與非華夏的文化與政治邊界。以農業（中國人自我界定的文化表徵之一）來說，燕山南麓地區的水平並不優於遼西地區。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氣候變遷（乾冷化），使得遼西地區的農業萎縮，人們得依賴更多動物，尤其是草食性動

¹¹¹ S. R. Charsley,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Urban Ethnicity*, ed. by A. Cohen (London: Tavistock, 1974), 337-68; Michael Banton, "The Direction and Speed of Ethnic Change," in *Ethnic Change*, ed. by Charles E. Key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31-52;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32-46.

¹¹² 王明珂，〈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3（1994）：119-40；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物，才能生存。在另一方面，生存資源減少，使得當地的人群為爭奪資源而武裝化；而戰爭又使得人們對於投資勞力於農業的意願降低。

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另一個變遷是，周人武裝殖民團體建立燕國，據有燕山以南地區。雖然，燕國作為周封建圈最東北部的封國，在政治上已造成一種分隔人群的邊界。但是，與周人一同去統治燕地的，還包括一些西方、北方人群，如馬方、羌方等。由西周到春秋，燕文化中有許多北方文化因素，並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共存。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中，也有許多周、燕文化因素。因此，在西周時燕國的建立，並沒有立即在文化上、或族群上造成明顯的華夏邊緣。

但是，北方地區的遊牧化與春秋時期華夏意識的強化，兩者相激相成，終於造成華夏北方邊緣的確立。這個過程的最後階段，大約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西周因戎禍而亡，對周封建國或周文化圈內各人群，造成相當的刺激。「華夏」這樣的自稱在文獻中愈來愈普遍；華夏成為極力維護自身族群邊界，以保護共同資源的人群。¹¹³ 燕國就在此氣氛下，受到齊國的保護而免除了山戎入侵的威脅。華夏愈互保以壟斷南方資源，愈逼使遼西與燕山山地的人群更依賴畜養動物，以及進一步的武裝化、移動化，以向南方侵奪。並且，為了對付南方華夏的團結對外，此時燕山以北及遼西地區的遊牧人群也結成較大的政治群體，如東胡。北方人群愈武裝化、移動化、畜業化，他們在華夏心目中的「戎狄性」就愈強，這種華夏心目中的「異族意識」進一步強化華夏的北方邊緣。終於，在西元前300年左右，燕國北征，將東胡往北驅趕了千餘里。然後，建長城以禦胡。這就是其殘跡今日仍橫綿於赤峰、建平、敖漢旗、北票、阜新等地的燕長城。¹¹⁴

這個變化，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與遼西燕山地區，幾乎是同步發生的。燕與其他北邊諸國築長城，與秦漢統一帝國的出現，便是華夏族群邊緣的具體

¹¹³ 王明珂，〈周人的族源與華夏西部族群邊界的形成〉，《大陸雜誌》87.2（1993）：9-12。

¹¹⁴ 李慶發、張克舉，〈遼西地區燕秦長城調查報告〉，《遼海文物學刊》2（1991）：41-2。

化象徵。雖然，在遼西與鄂爾多斯地區，後來都因遊牧與農業人群勢力的消長，而使得華夏邊緣的地理界線有些許的南北波動。但北方與東北方人群的全面遊牧化，使得一個生態性的華夏北方、東北方族群邊緣確立。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的遊牧人群，爲了適應新的政治經濟環境，此時也在遊牧生業與人群社會組織上作進一步修正；鄂爾多斯及北方草原人群結成匈奴「國家」，而遼西的遊牧人群分爲許多的遊牧部落，以此各自朝專化遊牧業發展。

（本文於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四日通過刊登）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West Liao-River Valley--and the Formation of Hwa-hsia Ethnic Boundaries

Wang Ming-k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West Liao-river Valley and the concomitant emergence of ethn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is area. Archaeological recoveries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o the Shang period the people of the West Liao-river Valley were basically farmers who also raised pigs and dogs. In the last stage of Lower Hsia-chia-tien Culture, while the climate became drier and cooler, people adapted to this new environment by reducing farming, and increasing raiding. This finally was followed by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drastic reduc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After the period of 'interruption', this area was re-occupied by the people of Upper Hsia-chia-tien Culture who, compared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pper culture, depended less on agriculture and more on herding domesticated herbivores. This adaptive strategy caused increasing need of wider subsistence niche for every human unit, and caused more fierce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and further militar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among the people.

The more the northern people became pastoralized, militarized, and mobilized, the more they became "barbarous" in the eyes of the sedentary people in the south.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hostile exonym Jung-Ti, as opposed to the autonym Huahsia (ancient Chinese) emerg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Huahsia now became a powerful human group for protecting or grabbing living resources in this area. In response to this change the people of the West Liao-river Valley became full nomads.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nomadic state Tunghu to the more segmentary and egalitarian Wu-huan and Hsian-pei tribal confederacies marked the finally stage toward specialized nomadism in this area.